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MI 入库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3 辑

2025(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学术顾问

(以姓氏拼音为序)

阿旺嘉措 巴桑旺堆 才让 黄维忠 李志农
刘志扬 罗布 沈卫荣 苏发祥 索端智 仝涛
谢继胜 夏格旺堆 叶拉太 意西微萨·阿错 张云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霍巍 石硕

执行主编 张长虹

副主编 玉珠措姆 陈波

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博 李锦 李帅 励轩

(以姓氏拼音为序) 吕红亮 南英 熊文彬

徐君 杨锋 邹立波

本期编辑 张延清 嘎尔让 许渊钦

杨清凡 李志英 卢素文

英文摘要 麦伟哲 (William A. McGrath)

编辑部主任 孙昭亮

目 录

唐李知古经略姚州相关史实考察——兼论睿宗朝对吐蕃政策的两次转向	严寅春 薛婧 / 1
元明时期西藏回遮蒙古人之咒术仪轨实践探析	多杰仁青 / 12
宗喀巴与帕竹地方政权交往关系新探	拉毛加 / 32
1708 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驻留西安广仁寺考——以一道《康熙满文朱批奏折》为证	胡晓兵 次仁德吉 / 49
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与雍正八年的瞻对之役	刘锡钺 / 70
康雍乾嘉朝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赖喇嘛考述	苏都必力格 呼和 / 87
八世哲布尊丹巴在藏转世史实考	孙琦 / 103
藏文梵语拼读法类文献研究（一）：从 10 世纪末的梵文转写到西藏第一部梵语拼读法文献	扎西本 / 116
托忒文文献《札哈沁寺庙志》考述	M. 乌兰 阿音娜 特尔巴图 / 154
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颇萨”税考析	马睿 / 168

梅·戈尔斯坦及其美国与中国西藏地方事务关系研究	柳欢 徐海霞 / 187
近五十年来《川番译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振 / 201
陈庆英先生藏学年谱初编	许文静 / 216
互动与交融：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评述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 245	
摘要	/ 278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Li Zhigu's Governing of Yaozhou —— Two Shifts in Emperor Ruizong's Policy Toward Tubo <i>Yan Yinchun Xue Jing</i>	1
An Analysis of the Mongol-repelling Ritual Practices in Xizang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Dorje Rinchen</i>	1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songkhapa and the Pakmodrupa Regime <i>La maojia</i>	32
A Study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tso's Travels to the Guangren Temple in Xi'an in 1708 <i>Hu Xiaobing and Ciren Deji</i>	49
The Relocation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to Kham Region and the Battle of Nyarong in 1730 <i>Liu Xiyue</i>	70
A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of the Zasak Da Lama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i>Sodbilig Huhe-Borjigid</i>	87

A Study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Eighth Jebtsundamba in Xizang <i>Sun Qi</i>	103
Reading Sanskrit in the Tibetan Literature (1): From Tenth-century Transliterations to the First Tibetan Guide to Sanskrit Pronunciation Methods <i>Tashibum</i>	116
An Examination of the Todo Script Document: <i>The Chronicle of Jakhachin</i> <i>Monastery</i> <i>M. Ulaan, Ayanna and Töröbatu</i>	154
An Analysis of the <i>Posa</i> Tax in Southeast Xizang, China <i>Ma Rui</i>	168
Melvyn Goldstein and His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cal Affairs of Xizang in China <i>Liu Huan and Xu Haixia</i>	187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Research on the <i>Chuanfan yiyu</i>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i>Wang Zhen</i>	201
A Preliminar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Prof. Chen Qingying in Tibetology <i>Xu Wenjing</i>	216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 Review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long the Plateau Silk Road <i>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i> <i>Xiz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	245
ABSTRACTS	278

近五十年来《川番译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振

内容摘要：《川番译语》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汉语—民族语”双语辞典，是记录清代前期川西藏缅语族藏羌语支语言的重要历史文献。回顾过往，近五十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译语文献整理和基于译语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材料从单纯的文献资料到文献与田野调查材料的结合，研究对象从译语记录的民族语到译语中用来注音的藏汉文字的基础方言，研究视角从共时描写到历时比较。展望未来，《川番译语》文献整理与校勘、文本解读与语言研究、专题田野调查等方面仍待我们继续努力。

一、引言

“西番译语”是“华夷译语”系列文献的一部分，是明清时期编纂的以汉字音译藏语言的辞典，反映了“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 本文系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2025年“揭榜挂帅”课题“近现代西南边疆地区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XNZZSH2504)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川滇民族文化数字化与传播重点实验室”资助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构建的历史基础¹，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和史料价值。

“西番译语”系列文献包括四类——（1）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乙种本《西番馆译语》，包括杂字（对译词表）和来文（往来公文）两部分，其中杂字包括 20 个门类，740 个词语；（2）明代后期编纂的丙种本《西番馆译语》，包括 18 个门类，749 个词语；（3）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川番译语》²，属丁种本，共计 9 种，记录了川西地区 9 种藏缅语族藏、羌语支的语言或方言，其门类设置与收词跟乙种本相同；（4）新出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亦属丁种本《西番译语》，包括 20 个门类，2103 个词语³。其中，《川番译语》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冯蒸分别以编号命名，孙宏开按照采集地点或所记录的语言命名，各初编本均按照“A 属 B 西番译语”的模式命名，故宫藏本封面名称均为《川番译语》。详见下表。

编号命名	采集地点或所记语言命名	译语初编本名称	故宫藏清抄本名称
川一	《松潘译语》	《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	封面题签为“川番译语”，正文卷首均写有“西番译语”四字
川二	《象鼻高山译语》	《松潘属象鼻高山西番译语》	
川三	《嘉绒译语》	《松潘属瓦沃杂梭大小金川各西番译语》	
川四	《白马译语》	《松潘属白马路西番译语》	
川五	《栗苏译语》	《泰宁属沈边冷边西番译语》	
川六	《木坪译语》	《泰宁属木坪各村寨西番译语》	
川七	《打箭炉译语》	《泰宁属明正土司所管口外各西番译语》	
川八	《多续译语》	《建昌属大盐井酥州等各西番译语》 ⁴	
川九	《木里译语》	《建昌属木里瓜别各西番译语》	

1 彭学云：《方音记词：〈西番译语〉校雠》，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37。

2 这类译语封面所写是“川番译语”。书内序言之前写的是“西番译语”。两种名字学界通用。本文以《川番译语》称之，以便与第 4 种新出清抄本《西番译语》区别。

3 参见施向东：《新出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校勘手记》，《辞书研究》2021（6）：95-102，本文沿用施向东的说法，称之为“新出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简称“新出本”。“新出本”在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2）：57-68]的附表一中已经提及，列入“丁种本”，表中编号为 41，书名《西番馆译语》，并指出了其包含 20 个门类、2103 个词语。

4 川四初编本未见、川八初编本在收藏过程中遗失了题签页，故初编本名称不详，表中川四、川八初编本名称是笔者根据译语命名原则推测得来的，详见王振：《清代〈西番译语〉的序言和命名原则考察》，《西藏研究》2019（4）：139-144。

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先生于1973年出版《多续译语研究》一书,开启了《川番译语》系列文献研究的新篇章。自此以来的50多年间,学界对《川番译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川番译语》研究成果,分析已有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就,以求在总结学术史的基础上为深化译语研究和基于译语的语言学研究提供参考。

已有成果主要可以分为文献整理和语言研究两大类,以下分别论述。

二、《川番译语》文献整理

(一) 译语文献追踪与编纂过程考察

闻宥先生在1979年即发文介绍“华夷译语”在海外的流布、传播、收藏和研究情况,还特别论及西田龙雄所著《多续译语之研究》⁵。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介绍流布海外的译语并关注到西田龙雄著作的文章⁶。冯蒸的《“华夷译语”调查记》一文,全面考察了北京地区收藏的“华夷译语”,并对9册《川番译语》以“川一”至“川九”的顺序编号定名,沿用至今。该文还对译语记录的语种作了初步考察,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介绍“华夷译语”之文章,有拓荒之功⁷。杨玉良介绍了包括《川番译语》在内的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内府抄录本“华夷译语”的编纂背景、内容、体例等,指出九册译语“列二十门编次,辑杂字七百二十六至七百五十一个不等”⁸。或由于当时所见材料之限,该文统计的译语收词数量与实际略有出入——《川番译语》9种应为统一词表,均20门类、740个词语。此外,任小波《明清〈西番译语〉传本寻踪》一文梳理了海内外各类《西番译语》的主要传本,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内府抄本《西番译语》一种5册,

5 闻宥:《国外对〈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评西田龙雄的〈华夷译语研究丛书〉》,《外国研究中国》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83-88。另有闻宥:《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介绍西田龙雄的〈研究丛书〉》,《学术集林》卷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44-249,该文题注指出“本文为作者未刊遗稿”(据文末标注,此文成稿于1977年),经比较,该文与《外国研究中国》(1979)所发论文,除个别措辞不同之外,其他内容和表述并无二致,实为一文,说成“未刊遗稿”似有不妥。此外,冯蒸《近十年来国外汉藏系语言研究情况简介(1964—1974)》(《外国研究中国》第二辑,1979:14-82)中也提到了西田龙雄对《多续译语》的研究。

6 房建昌《西田龙雄与〈西番馆译语的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2):20-25,对西田龙雄的研究成果作了更为具体的介绍。

7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2):57-68。

8 杨玉良:《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译词典——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4):67-69。

此即收录 20 个门类、2103 个词语的新出本，但未提及《川番译语》⁹。

聂鸿音、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一书的“导论”分为“明代四夷馆的设立与‘华夷译语’的编译”“清代‘华夷译语’的编译”“国内外‘华夷译语’之研究”“清代九种《西番译语》的编译及研究”“清代九种《西番译语》的地域分布”等 5 个部分，可视作 5 篇“华夷译语”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中论述清代《川番译语》的编纂过程和地域分布，细致考察了 9 种译语序言中所提及的地名，为了解译语资料的采集范围提供了重要参考¹⁰。孙伯君重点考察了故宫藏 9 册清代《川番译语》抄本各自所对应的初编本，明确了其中 8 册译语初编本的收藏地点，推定了《白马译语》（川四）、《多续译语》（川八）两种译语初编本的名称¹¹。王振全面考察了《川番译语》序言的编纂体例，归纳出初编本的命名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定了川四、川八两种译语初编本的名称¹²，并将明清四类“西番译语”所收录的词条及门类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其联系与差异¹³。

春花《论〈西番译语〉及〈川番译语〉编纂始末》一文讨论了五册一函《西番译语》（即本文所谓“新出本”）和丁种本《川番译语》的编纂过程与相互关系。该文结合史实背景并通过对乾隆帝关于采编译语的上谕和四川总督策楞奏折的分析，认为“原四译馆藏有《西番译语》（《西番书》），乾隆十三年，皇帝命将其重新考订”，新出本《西番译语》是乾隆年间对原四译馆藏《西番译语》（《西番书》）考订的结果，“是乾隆十三年由原‘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的校勘本”，即新校勘之《西番译语》，而《川番译语》则以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即新出本为蓝本采编；该文还罗列了《川番译语》序言原文（并附原图）并对比其与新出本《西番译语》门类设置、收词方面的异同。这为新出本译语和《川番译语》的编纂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¹⁴。不过，这两类译语中的“汉字及汉字注音字的著录方式不完全相同，《川番译语》的汉字及汉字

9 任小波：《明清〈西番译语〉传本寻踪》，《中国藏学》2009（3）：128-132。

10 聂鸿音、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3。

11 孙伯君：《乾隆敕编九种〈西番译语〉初编本及其定名》，《满语研究》2012（2）：70-72。故宫藏清抄本均名以《川番译语》，这是整理抄录时新定的，四川采编译语时各种译语取名不同，基本模式是“A属B西番译语”，名字中均有关键词“西番译语”。川八初编本题签遗失，川四初编本未见，故其初编本的名字未知。

12 王振：《清代〈西番译语〉的序言和命名原则考察》，《西藏研究》2019（4）：139-144。

13 王振：《明清四类“西番译语”收词比较与关系探讨——兼谈〈噶唎译语〉的收词问题》，《语言历史论丛》第15辑，2020（2）：172-182。

14 此说提出了新的见解，但《西番书》今未见，相关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音字均横写,《西番译语》汉字及汉字注音字却竖写,并在对音字中带有半音”¹⁵。可见,两类译语收词和书写体例上的差异相当大。相比之下,《川番译语》跟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的门类设置、收词和体例一致,因此更可能以乙种本为蓝本。

(二) 译语原文整理与校勘

西田龙雄在研究乙种本《西番馆译语》时也梳理了《松潘译语》的材料,并与乙种本同时列出加以比较¹⁶。后来,太田斋对《松潘译语》逐条校勘,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¹⁷。孙伯君考察并全文公布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松潘译语》复抄本,将该抄本与故宫藏本进行对勘,认为其比故宫本更接近初编本¹⁸。西田龙雄根据《多续译语》原始资料,整理出了包括藏文拉丁转写、清代多续语拟音、译语汉字注音、汉语词条及其英语翻译等在内的“多续—汉”词汇表,并影印公布了日本今西春秋所收藏的初编本《多续译语》¹⁹。西田龙雄、孙宏开根据《白马译语》原始资料,整理出了包括汉义、汉字注音、藏文转写、现代白马语口语读音、词条英译等在内的“白马—汉”词汇表,并在书末附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九种西番译语对照本”的照片²⁰。后来,孙宏开等在《白马语研究》一书中重新整理、刊布了《白马译语》,并论述其性质与价值²¹。

池田巧对《嘉绒译语》的“身体门”和“声色门”作了释读和校勘,发现《嘉绒译语》“所含的错误相当多”,主要包括音译汉字的笔误、藏文拼写的笔误、采访时的误解导致的错误,需要对比不同版本的《嘉绒译语》,或者依托当代嘉绒语资料对《嘉绒

15 春花:《论〈西番译语〉及〈川番译语〉编纂始末》,《藏学学刊》第23辑,2020(2):105-121。其中所谓“半音”可能是指新出本《西番译语》中的小字注音,新出本《西番译语》中藏文音节在译音时被拆分,音节中的核心成分(声母的基本辅音、韵母的主要元音)用正常大小的汉字对音,而前置辅音、介音或韵尾等,则以字号较小的汉字对音,此种做法使得译音更加精细、准确。新出本《西番译语》注音体例详见施向东:《清抄本〈西番译语〉藏汉对音译例研究》,《民族语文》2019(4):3-14。关于新出本所记录的藏语属性,可参见朗杰扎西:《新见清抄本〈西番译语〉蒙式藏语读音考》,《民族语文》2024(2):93-104。

16 西田龍雄:『西番館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70:81-107。书中所列《松潘译语》为天理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称为“天理本”。

17 太田齋:『[資料]丁種西番訳語(川一)校本(稿)』,『外國學研究』(69),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2008:109-164。

18 孙伯君:《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兰州学刊》2015(9):106-119。

19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73:118-160;附录。

20 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90:60-107;附录。

21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白马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38-182。

译语》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分析²²。孙伯君、松川节介绍了日本大谷大学所藏四种《川番译语》(川五、川六、川七、川九)的初编本,并将“天文门”“地理门”的内容与清抄本作了比较与对勘²³。这四种译语后来由松川节、三宅伸一郎编著出版²⁴。

朗杰扎西分析了《象鼻高山译语》藏文和音译汉字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六种类型,其中“藏汉义一致,藏文拼写基本正确”的词条比例最高,占近半数,但也有藏文拼写有误、藏文只能表音之类的情况。该文对所有词条的藏文书写进行了分析和校勘,是藏文整理校勘之典范²⁵。王振将日本今西春秋藏《多续译语》初编本和故宫所藏《多续译语》清抄本进行详细比较,发现两个版本之间百余处不同,对汉语词条、汉字注音和藏文注音作了校勘,并发现今西春秋藏本即所谓“初编本”也并非最原始的版本,其中也不乏错讹之处,应是根据原始调查材料抄录整理而成的。该文称之为“原始抄录本”²⁶。达瓦卓玛基于田野调查资料,释读了《打箭炉译语》中的疑难词条,并对部分存在偏差的藏文作了校释和分析²⁷。

2018年《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该书将院藏乾隆年间“华夷译语”抄本全部影印出版,让学界得以一览《川番译语》以及乾隆年间所编所有译语之全貌,意义深远。全书共十八卷,其中第二至四卷为《川番译语》——第二卷包括川一《松潘译语》、川二《象鼻高山译语》、川三《嘉绒译语》²⁸,第三卷包括川四《白马译语》、川五《栗苏译语》、川六《木坪译语》²⁹,第四卷包括川七《打箭炉译语》、川八《多续译语》、川九《木里译语》³⁰。

将全部《川番译语》加以汇编的现代整理本有两种:一是《〈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故宫本《西番译语》的晒蓝本,将包括《川番译语》九种以及《草地译语》一种在内的明清十种译语汇编于一册,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³¹;

22 池田巧:《〈嘉绒译语〉研究:“声色门”及“身体门”校释》,《民族古籍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9-30。关于“声色门”校释的内容又见于池田巧:『《嘉绒译语》概説』,『太田斎・古屋昭弘両教授還暦記念中国語学論集』,東京:好文出版,2013:153-163。

23 孙伯君、松川节:《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世界民族》2015(3):99-106。

24 松川節、三宅伸一郎:『“華夷譯語(西番譯語四種 猓羅譯語一種)”影印と研究』,京都:中西印刷株式會社,2015:31-253。

25 朗杰扎西:《〈象鼻高山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初步考查》,《西藏研究》2018(6):92-103。

26 王振:《〈多续译语〉版本考察》,《新世纪图书馆》2017(9):76-81。

27 达瓦卓玛:《〈打箭炉译语〉汉藏对译研究》,《中国藏学》2022(6):174-189。

28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二卷,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1-611。

29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三卷,2018:1-611。

30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四卷,2018:1-613。

31 聂鸿音、孙伯君:《〈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2010:64-390。

二是《方音记词：〈西番译语〉校讎》，以国家图书馆藏晒蓝本译语为底本，对译语藏文进行认真辨识，将清代九种《川番译语》进行“重组”，把各译语相同的词条汇纂在一起，并附现代藏语写法，方便“直观地看出各方言相同词间的异同，同时可以与现代藏语进行比较”，为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领域提供了“一个直观便捷的研究路径”和可靠的资料来源³²。

三、《川番译语》语言研究

（一）对译语所记语言（或方言）的考察

这类研究属于共时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清代译语记录的当时的少数民族语言。西田龙雄先生根据《多续译语》中的藏汉注音材料，考察了18世纪中期多续语的语音和语法面貌，并分析了多续语的系属问题³³；该著作在讨论《多续译语》时，还将《嘉绒译语》中的74个词语和现代嘉绒语资料作了比较，发现其与嘉绒语校磨话一致性较强³⁴。西田龙雄、孙宏开立足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开展《白马译语》研究，找到了译语记录的所有词条在现代白马语中的读音，系统描写了白马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该专著将田野调查的现代语料和译语文献资料相互补充与印证，将《川番译语》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³⁵。孙宏开先生是我国最早系统考察《川番译语》所记语言种类的学者。他通过译语序言中记载的地点以及译语注音材料与现代实际语音的比较，基本确定了清代《川番译语》所记录的语言及其系属和地域分布，将译语文献和现代语言对应起来，并根据译语采集的地方和所记录的语言对9种译语重新命名，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³⁶。

铃木博之通过译语文献注音与现代读音之比较，考察《木里译语》《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象鼻高山译语》所记录的藏语的特点和属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将《木里译语》与四川甘孜州和云南迪庆州的部分藏语方言比较，发现其所记录的确是

32 彭学云：《方音记词：〈西番译语〉校讎》，2021：39-409。

33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1973：18-273。

34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1973：23-26。

35 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の研究』，1990：59-316。

36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327-342。根据孙宏开先生的研究，9种《川番译语》所记录的语言情况如下：川一《松潘译语》记录的是松潘或南坪等地的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川二《象鼻高山译语》记录的是平武县境内的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川六《木坪译语》、川七《打箭炉译语》和川九《木里译语》记录的是藏语康方言；川五《栗苏译语》、川八《多续译语》分别记录了尔苏语的中部方言（栗苏语）和西部方言（多续语）；川三《嘉绒译语》记录的是嘉绒语东部方言；川四《白马译语》记录的是平武县的白马语。

某种藏语方言的口语形式，但尚未明确具体是哪一种方言³⁷；参考《木坪译语》序言所载地域，通过与现代藏语方言语音和词汇方面的比较，认为《木坪译语》记录的语言与现代丹巴县使用的康方言中的“二十四村”方言十分接近³⁸；构拟了《打箭炉译语》所记录的18世纪藏语打箭炉方言音系，发现其与现代木雅地区分布的藏语方言比较接近，推测为18世纪藏语木雅方言的一个子方言³⁹，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打箭炉译语》记录的语言应属于木雅热岗藏语⁴⁰；将最新的藏语支资料与《象鼻高山译语》记录的语言特征进行比较，发现《象鼻高山译语》记录的是藏语支语言，“应属于东部组，与白马语有着联系但不确定有两者之间的亲属关系”⁴¹。池田巧对比了故宫藏本和大谷大学藏本《栗苏译语》，分析其异同和特点，发现《栗苏译语》中的藏文源自《草地译语》，有200个词的汉字注音与汉文词目用字相同，认为这类词并非借词，而是由于尔苏语中无这些词而直接用汉文词目为汉字注音“填空”，本文还将译语中部分词条与现代尔苏语进行比较，初步分析了清代尔苏语的词汇特点⁴²。

此外，朗杰扎西《〈松潘译语〉（川一）语音现象初探》一文认为《松潘译语》音系并非纯口语音系，因其收词大多为书面语词汇，所以读音也有书面语读音的成分⁴³。王振通过词汇比较、语音历史层次比较、构词特点与文献考察，讨论了《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录的尔苏语方言，认为川五记录的可能是尔苏语东部方言，同时该文也为考察译语所记录的语言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⁴⁴。王振《〈嘉绒译语〉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一文通过译语藏汉注音，归纳了译语记录的清代嘉绒话音系的基本面貌和主要

37 鈴木博之：「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九〉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里チベット語の特徴」、『華夷訳語論文集』（語学教育フォーラム13），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2007：83-94。

38 鈴木博之：「丁種本《西番譯語》〈川六〉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坪チベット語の特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7（22）：157-180。同样的观点也见于鈴木博之：《清代木坪土司所管地区的藏语方言》，《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1-5。

39 鈴木博之：「《西番譯語》〈川七〉18世紀チベット語打箭爐方言の性格について」、『京都大學言語學研究』2009（28）：33-63。

40 鈴木博之：《〈天全译语〉及〈打箭炉译语〉与当代木雅热岗藏语之关系》，《东方藏区诸语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243-258。

41 鈴木博之：「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の性質について」、『雲漢』2024（2）：84-103。

42 池田巧：「大谷大學所藏本《呂蘇譯語》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94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9：424-436。池田巧原文称《吕苏译语》和尔苏语（Lyuzu），我们论述时参考较为普遍的说法，改称《栗苏译语》和尔苏语。

43 朗杰扎西：《〈松潘译语〉（川一）语音现象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5）：167-176。

44 王振：《〈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语言学论丛》第63辑，2021（1）：172-192。

特点,并讨论了藏汉注音的功能和局限⁴⁵。

(二) 基于译语的民族语历史音变研究

基于译语资料开展民族语历史音变的研究,属于历时角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将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与清代丁种本《川番译语》进行比较,考察明清时期的藏语历史音变。孙宏开《〈西番译语〉再考》,通过明代《西番馆译语》和清代《松潘译语》《打箭炉译语》之比较,论述了500年来藏语语音发展的脉络⁴⁶。施向东考察了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的语音特点,并将其与《川番译语》注音进行比较,分析了明清时期藏语语音的发展状况⁴⁷。

二是将清代译语文献与相应的现代语音材料进行比较,总结清代以来民族语的语音演变。比如通过《多续译语》记录的清代多续语资料和田野调查的现代多续语的比较,总结出多续语中辅音n与l相混、鼻冠成分丢失、ha>wa⁴⁸以及Tsj>Te、ja>nja、nja>ja⁴⁹等历史音变规律。此外,朗杰扎西考察了《松潘译语》和《象鼻高山译语》的基础音系及其反映的藏语历史音变⁵⁰。王振通过《嘉绒译语》和现代嘉绒语的比较以及现代嘉绒语不同方言土语之间的比较,研究了清代以来嘉绒语东部方言辅音和元音的历史演变⁵¹,并按照类似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清代《栗苏译语》(川五)与现代尔苏语方言之间的比较,考察了清代以来尔苏语的历史语音演变⁵²。池田巧讨论川五所记录的尔苏语,重点考察了“声色门”当中的14个词语,将译语记录与现代尔苏语比较,并参考19世纪西方人记录的相关材料,发现仅这14个词语的材料就显示出译语跟现代语言之间的五种对应关

45 王振:《〈嘉绒译语〉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西藏研究》2020(1):123-129。

46 孙宏开:《〈西番译语〉再考》,《中国语文研究》2002(1):84-96。

47 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6(2):2-13。

48 Katia Chirkova,“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2014(1):104-146。

49 王振:《多续语中与-j-相关三个历史语音现象——兼谈〈多续译语〉中-j-介音的表现形式》,《南开语言学刊》2020(1):122-129。

50 朗杰扎西:《〈松潘译语〉(川一)语音现象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5):167-176。朗杰扎西:《〈象鼻高山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初步考查》,《西藏研究》2018(6):92-103。

51 王振:《嘉绒语东部方言的辅音对应和历史演变——基于清代〈嘉绒译语〉和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辞书研究》2020(2):112-119。王振:《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元音对应及其历史演变——基于清代〈嘉戎译语〉和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民族语文》2021(3):87-94。

52 王振:《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语言科学》2021(4):436-448。

系，体现出译语资料解读上的复杂性⁵³。

（三）译语藏文注音基础方言及其特点的考察

《西番译语》中的藏文主要有三种性质：一是记录藏语，使用藏文正字，藏文有记音功能；二是记录非藏语，藏文仅作为纯粹的注音符号使用，藏文有记音功能；三是记录非藏语，但也使用藏文正字，藏文无记音功能。本文所谓“藏文注音基础方言”主要针对的是其中第二种，包括川三、川四和川八。这类译语中藏文不用正字，而是根据所记录的民族语词的读音，选择藏文字母拼合成不同的音节来记录，这类藏文可称为“记音式藏文”。藏文字母或字母组合在不同藏语方言中有不同的读音。记音式藏文选取时所依据的藏语方言即为藏文注音的基础方言。这类译语中藏文注音基础方言的音系也被称为译语的“藏文音系”，以区别于译语所记录的民族语的音系。因此，这类译语其实涉及三种音系，以《多续译语》为例，涉及译语记录的多续语的音系，还有作为注音符号的藏文音系，以及注音汉字基础方言的音系即汉字音系。

前文已经提到，前辈学者结合记录藏语的几种译语，开展藏语语音史的研究。近年来记录非藏语的译语中藏文注音的基础方言及其对藏语语音史的价值逐渐被重视起来。《〈多续译语〉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一文关注到记录非藏语的译语中藏文注音对于藏语语音史的研究价值，通过汉字注音推测藏文符号的音变规律，推测《多续译语》中的藏文注音以藏语康方言读音为基础，对近代藏语康方言语音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⁵⁴；《清代“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一文结合《白马译语》的材料，再次强调了记录非藏语的“记音式”藏文对藏语语音史研究的价值，发现《白马译语》藏文音系可能揭示18世纪中期康方言的某些语音面貌⁵⁵；《清代〈嘉绒译语〉藏文注音的规律和性质》讨论了《嘉绒译语》的藏文音系，认为记录该译语中用来记录嘉绒语的藏文基础方言是安多话，能够反映出清代安多话的音系特点⁵⁶。

53 池田巧：「《西番譯語》に記録されたリユズ語」，福盛貴弘、遠藤光曉編『華夷訳語論文集』（語學教育フォーラム13），東京：大東文化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2007：95-106。

54 王振：《〈多续译语〉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南开语言学报》2016（2）：22-31。

55 王振：《清代“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以〈白马译语〉藏文注音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5）：162-170。

56 王振：《清代〈嘉绒译语〉藏文注音的规律和性质》，《藏学学刊》第23辑，2020（2）：122-140。

(四) 基于译语对音材料的汉语历史语音研究

9种《川番译语》虽然藏汉对应关系有所不同,但是均用汉字给民族语注音,这一点是一致的。关于汉字注音的基础方言,西田龙雄先生参考近代北京音解读译语注音汉字,据此考察了川八所记录的多续语⁵⁷。此后,西田龙雄和孙宏开⁵⁸、铃木博之⁵⁹、Chirkova⁶⁰等学者都提到了其所考察的译语汉字注音具有西南官话或者四川方言的语音特点,但未作专题研究。

目前我们所知专门运用《川番译语》材料研究汉语方音问题最早的文章应是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⁶¹。该文根据《川番译语》藏汉对音材料讨论了清代川西汉语方音的一些特点,体现出译语材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价值。其他成果还讨论《栗苏译语》《多续译语》《嘉绒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凸显了译语文献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总结出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主要方法⁶²。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9种《川番译语》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应该都是四川官话,但是其具体音系特点并非完全一致。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并非因为九种译语汉字音系基础方言的不同,而是由于当时四川官话本身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因此,开展《川番译语》汉字音系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四川官话的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例如《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一文即以9种《川番译语》藏汉对音材料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为基础,结合现代四川方言资料,讨论了明清以来四川方言泥来母分混的类型和演变过程,深化了对四川方音史的认识⁶³。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其他“华夷译语”的对音研究涉及汉语语音的成果也十分丰富,可为《川番译语》研究提供思路借鉴。例如:曾晓渝探讨了明清时期《百夷译语》

57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1973: 5-7。

58 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の研究》,1990: 60。

59 鈴木博之:「丁種本《西番譯語》〈川六〉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坪チベット語の特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7(22): 157-180。鈴木博之:「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九〉に記録される18世紀木里チベット語の特徴」,『華夷訳語論文集』(語学教育フォーラム13),2007: 83-94。

60 Katia Chirkova,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4(1): 104-146。

61 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6(2): 2-13。

62 王振:《〈栗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2019(4): 69-77。王振:《〈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方言》2021(2): 228-237。王振:《清乾隆年间〈嘉绒译语〉译音汉字的方言属性与音韵特点》,《汉语史学报》第25辑,2021(2): 42-54。

63 王振:《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励耘语言学刊》2021(1): 70-79。

音译汉字反映的汉语方音的历史面貌⁶⁴；更科慎一讨论了明代乙种本“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所反映的汉语音系特点及其基础方言⁶⁵。布日古德出版专著《〈华夷译语〉(甲种本)音译汉字研究》，对明初编写的记录蒙古语的《华夷译语》中的音译汉字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其音系特点和基础方言⁶⁶。

四、总结与展望

如果从西田龙雄先生1973年出版《多续译语研究》算起，《川番译语》的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涌现出诸多成果，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就译语文献挖掘和整理而言，已经发现并公布了大部分译语的初编本和抄本，中日两国学者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很多研究成果不单单局限于某一种译语文献，而是将不同译语进行比较、将译语与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比较，以及将清代译语资料与现代调查的民族语资料结合，对译语文献进行解读，开展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研究。

第二，方法严谨。大多数成果都是基于严谨的对音研究的方法，对译语资料进行分析与研究。尤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大都对对音资料进行全面梳理、数据统计与比例分析，并结合现代田野调查的资料进行验证，增强了译语研究的科学性。此类研究“要求研究者须懂得汉藏系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具备汉语音韵学素养和历史语言学理论知识”，分析语音层次，总结历史音变，形成了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研究范式，“处民族语言学研究的高地”⁶⁷。

第三，视野开阔。已有的研究，不仅关注译语所记录的民族语言，还关注译语中的藏文和注音汉字，考察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及其音系特点，并逐步意识到非藏语类《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价值，提出藏文基础方言的概念。因此，

64 曾晓渝：《丙种本〈百夷译语〉语音现象初探》，《南开语言学刊》2014（1）：13-27。曾晓渝：《基于〈百夷译语〉的傣语汉语历史语音探讨》，《民族语文》2015（1）：23-37。

65 更科慎一：《论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汉语音系》，《南开语言学刊》2018（1）：37-45。此外，更科慎一还在“侗台语及汉藏语言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2003·天津）上宣读了论文《〈百夷馆译语〉音译汉字声调初探》，讨论了《百夷馆译语》中汉字音的调值和入声问题，其主要方法是考察注音汉字与百夷语（德宏傣语）之间的调类对应关系和规律；富田爱佳在“藏缅语·侗台语研讨会”（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2015）上发表了《关于〈车里译语〉音译汉字的声调》一文，比较了《车里译语》注音汉字和现代傣语之间的调值对应规律，进而考察了汉字音的声调系统。

66 布日古德：《〈华夷译语〉(甲种本)音译汉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56。

67 全国社科办语言学学科调研组：《语言学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84。

一种译语最多可以为三种语言的研究提供参考。以《多续译语》为例，汉字注音、藏文注音和现代多续语音三者之间建立对音关系，通过两种材料可以考察第三种材料的语音面貌，对于藏语、汉语和多续语的研究均有价值，体现出多维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一些《川番译语》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体现出译语研究方法、材料和视野的新开拓——孙宏开基本明确了九种译语所记录的具体语言和方言⁶⁸；西田龙雄、孙宏开将白马语田野调查资料与《白马译语》文献材料相结合，开创了译语研究的新范式⁶⁹；施向东研究了译语藏汉对音材料所体现的清代四川方音特点，发现了译语对汉语方音研究的价值⁷⁰；王振关注到非藏语类译语中“记音式”藏文的基础方言及其对藏语语音史研究的价值⁷¹；等等。

当然，《川番译语》无论文献整理还是语言研究，都还有一定的空间，仍待继续深入。

第一，文献整理与校勘。目前已经发现的译语文献，大都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出版，亦有校录整理本问世，为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版本就是初编本和故宫藏清抄本，清抄本已由故宫博物院全部影印出版，但初编本目前公开可见的只有5种，另外3种即《象鼻高山译语》《嘉绒译语》《白马译语》初编本尚未见刊布。可靠的文本是开展语言研究的基础，因此译语文本的校勘工作也至关重要。目前，《松潘译语》《白马译语》《多续译语》等已有较为完整的校勘，池田巧对《嘉绒译语》“身体门”和“声色门”作了校勘，孙伯君、松川节对《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木里译语》等的“天文门”、“地理门”作了校勘，还有一些译语文本的校勘工作仍待继续深入。施向东先生通过参照译例发现违反规则的错舛衍夺现象、以汉校藏、以藏校汉、利用藏文文字的书写特点发现失误等多种方法，考察新出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的失误之处，推断出可能的原貌，可为《川番译语》校勘工作提供参考⁷²。

另外，德庆央珍结合当下古籍数字化的背景，提出了建设《西番译语》在线词典的构想，“以期能够在更广泛层面发挥其学术应用价值，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及古籍保护工作”⁷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想法。虽然《川番译语》清抄本均已影印出

68 孙宏开：《西番译语考辨》，《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1989：327-342。

69 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の研究』，1990：59-316。

70 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6（2）：2-13。

71 王振：《清代“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以〈白马译语〉藏文注音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5）：162-170。

72 施向东：《新出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校勘手记》，《辞书研究》2021（6）：95-102。

73 德庆央珍：《藏文古籍数字化出版探索——〈西番译语〉在线词典构想》，《辞书研究》2021（4）：45-53。

版,但因印数和成本所限,译语文献资料的获取对一般研究者而言仍有一定的难度。将译语数字化,实现不同版本的在线比较阅读和译语词条的自由检索,应是古籍整理者和译语研究者共同的期待。

第二,语言本体研究。孙宏开先生考察了九种《川番译语》所记录的语言,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部分译语采集的具体方言点、记录的具体土语,仍不甚确切。基于不同译语对音材料比较的汉语方音研究尚且不够,基于译语对音材料的汉语声调方面的研究尚未见专门成果。语音是译语研究的重点,但译语材料对词汇和语法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多续译语》《白马译语》的词汇、语法研究较为深入⁷⁴,但其他译语的相关研究偏少⁷⁵。语音研究主要基于对音材料展开,对大多数对音材料所呈现的主流现象分析较多,对其中个别的、少数的、零散的对音现象分析不够、解释不足,有的仅以“例外”处之,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些“例外”中是否也有规律,可以去解释或者解读。

第三,翻译和辞书角度的研究。从翻译的角度对译语资料的分析 and 解读还不够。一方面,译语中存在一些翻译不准确的情况,例如《多续译语》中“懒惰”的注音是“mag tho—马兔”,实际意思是“不好”。为了充分认识译语文献,即使翻译不全然准确,也需要弄清楚所有词条的藏汉注音的理据和由来,对译音材料进行准确的解读。目前《川番译语》仍有部分译音材料尚不明其义、无法解释。这是一项繁重复杂而又非常必要的工作。另一方面,译语在处理民族语所没有的一些汉语词条时也有不少较为成功和巧妙的翻译案例,可为今天的“汉语—民族语”双语翻译提供参考。例如《多续译语》“衙门”的注音是“tsog mo yag—坐暮压”,字面意思即“官房”;“馆驿”的注音是“dbyib lag yag—依拉压”,这三个音节对应的意思分别是“去、来、房”;“盔”的注音是“shag rmog—沙帽”,字面意思即“铁帽子”。总之,此类文献“在我国翻译史上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⁷⁶,其翻译的经验和得失值得认真总结。此外,译语编写虽然

74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の研究』,1973:161-178。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の研究』,1990:189-275。

75 词汇方面,冯蒸先生有《〈川番译语〉词汇在汉藏词汇比较研究中的作用》一文在“华夷译语”和西夏字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2013·北京)上发表。该文将《川番译语》词汇与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以及郑张尚芳先生华澳语言比较三百核心词表作了比较,总结了译语收词与两者的异同。郑伟、盛雨婷、翟子颀、刘恬、王馨宇《从〈华夷译语·衣服门〉看明清赐贡制度及其文化含义》[《语言与文化论丛》第4辑,2021(2):70-83]以故宫藏清乾隆本《华夷译语》“衣服门”中的相关词汇为研究对象,比较明代译语材料,考察了明清时期服饰赐贡制度的相关问题,为《华夷译语》词汇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语法方面,孔祥卿基于偏正式名词在四种《猺罗译语》中的不同翻译,发现“彝语偏正式名词正在经历形容词性修饰成分由后向前的变化”,见孔祥卿:《从〈猺罗译语〉看彝语修饰语的位置》,《南开语言学刊》2016(2):14-21,对《川番译语》的相关研究有参考价值。

76 杨玉良:《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译词典——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4):67-69。

可能有方便语言入门学习的目的，但其本身的性质更近乎辞书。这是较早的官修的“汉语—川西藏缅语”双语辞书，在中国辞书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辞书学角度下的译语研究也有待深入。

第四，《川番译语》词表的专题田野调查。无论文本校勘、文献解读，还是语言本体及翻译研究，都离不开对《川番译语》的专题田野调查。正如池田巧先生在研究《嘉绒译语》时所提出的，“需要收集当代嘉绒语方言的调查资料”，在“以嘉绒语为母语的发音合作人的协助下，将《嘉绒译语》所记载的内容作更为详细的验证”⁷⁷。各种《川番译语》都需要开展系统化和专题性的田野调查，而且有必要对译语采集区域范围内的多个相关方言点进行全面调查，为译语文本解读和校勘、译语所记录的具体方言的考察以及相关语音史研究奠定资料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当代民族语资料的获取，也可以通过现有的词典加以查询，但译语对词语的翻译和注音存在多种复杂的情形，单纯依赖词典的话，有不少词语的译音是解释不了的。例如《嘉绒译语》“涧”汉字注音为“开固”，我们在四川小金县调查得知，当地嘉绒语 [khai gu] 指旧时嘉绒使用的木制水管，用来从山上往下引水；《栗苏译语》“梯”的汉字注音为“杂鸡”，在尔苏语各方言中都找不到“梯”有类似的读音。调查得知，尔苏语 [tsa tei] 指的是“墙”，可能因梯子常靠在墙上，译语采集者指墙边的梯子而发音人误译了“墙”⁷⁸。诸如此类的问题，若非实地调查，则难以解释。聂鹏《〈永宁属水潦猓罗译语〉校释》立足深度田野调查，对《永宁属水潦猓罗译语》作了详细校勘和释读，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翻译问题，进而论及该译语的编纂流程及译者身份问题，也凸显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⁷⁹。目前部分《川番译语》的田野调查尚不全面，对整本译语的系统调查不足，而这恰恰是深化译语研究的必由之路和关键之处，有待继续推进。

◆ 王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77 池田巧：《〈嘉绒译语〉研究：“声色门”及“身体门”校释》，《民族古籍研究》第2辑，2014：30。

78 《栗苏译语》有词条“墙—咱己”，与“梯—杂鸡”注音基本一致，亦可为证。

79 聂鹏：《〈永宁属水潦猓罗译语〉校释》，《民族语文》2018（3）：81-97。

Melvyn Goldstein and His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cal Affairs of Xizang in China

Liu Huan and Xu Haixia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a long time,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affairs of Xizang in China, wantonly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numerous studies on this issue. Approaching the to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scholarship, this paper us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Melvyn G. Goldstein as an entry point to fully recognize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his work. This examin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i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Tibetology discourse of domestic scholar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Tibetology research, refuting its erroneous viewpoints appropriately, and absorbing its valuable insights.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Research on the *Chuanfan yiyu*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Wang Zhe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Chuanfan yiyu* 川番译语 is an officially compiled Chinese-ethnic bilingual dictionary from the Qianlo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serving as a vital historical document that records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Tibetan and Qiangic branches in western Sichuan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L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guided by the pioneering generation of scholars, fruitful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uanfan yiyu* and relevant linguistic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materials have expanded from purely textual documents to a combination of philological texts and fieldwork data; the subjects of inquiry have shifted from the target minority languages recorded in *Chuanfan yiyu* to the basic dialects of Tibet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for phonetic transcription;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evolved from synchronic description to diachronic comparis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continuous efforts are still required in the text collation and critical editing of the *Chuanfan yiyu*,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as well as specialized fieldwork.